

列 寧 著

我們究竟拒絕 什麼遺產？



列 寧 著

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097

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

著者：列寧
譯者：曹葆華 毛岸青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0,001—15,000

一九五二年二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三版

曹葆華 毛岸青譯

В. И. ЛЕНИН

ОТ КАКОГО НАСЛЕДСТВА МЫ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目 錄

一 「遺產」代表者之一	三
二 民粹派給「遺產」所作的添加	二二
三 「遺產」從與民粹主義的聯繫中能贏得什麼？	三三
四 「啓蒙者」、民粹派分子和「學生們」	四八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論「學生們」拒絕遺產	五五
簡要註釋	五三
譯後記	六四

在一八九七年第十期俄國財富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重述明斯基先生對『辯證唯物論者』的批評時寫道：「他（明斯基先生）大概知道，這些人根本就不願意與過去有什麼繼承性的聯繫，並且堅決地拒絕遺產」（第一七九頁），這就是說，拒絕羅扎諾夫先生在一八九一年莫斯科新聞上正大堂皇地拒絕了的『六十——七十年代的遺產』（第一七八頁）。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俄國學生們』的這個批評中，謊言是很多的。誠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並不是『俄國學生們拒絕遺產』這一謊言底唯一製造者，也不是這一謊言底第一個製造者，——這一謊言是自由民粹派刊物差不多所有的代表者在反對『學生們』時很早就再三說過的。就我記得的而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開始

與『學生們』激烈作戰時還沒有想到這個謊言，而是別人比他更早就捏造出來了。後來他才認為必須唱和這個謊言。『學生們』在俄文著作中把自己的觀點發揮得愈多，他們在許多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上發表意見愈詳盡和周到，敵對刊物上根本反對新傾向底基本要點的意見可能就愈少，這些基本要點就是：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是進步的，民粹派之把小生產者理想化是荒謬的，社會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制度必須在俄國社會各個階級底物質利益中去尋找解釋。這些基本要點不會被理睬，民粹派分子過去和現在都寧願不談到它們，——但却更多地從事於一定要使新傾向信譽掃地的捏造。屬於這一類『捏造』、『笨拙的捏造』的，是說『俄國學生們拒絕遺產』、說他們與俄國社會優秀先進部分底優秀傳統脫離了關係、說民主主義的綫索被他們割斷了，以及其他等等這種流行的話，而且他們還隨便胡說一套。這類話流傳很廣，使我們不得不仔細地考察和反駁它們。爲了使我們的敘述不使人覺得只是一堆空話，我們開始把兩個舉出來說明『遺產』特徵的『農村政論家』作一個歷史和著述方面的對照。我們在此附帶聲明：我們完全只限於經濟方面和政論方面的問題，從全部『遺產』中只考察這些問題，而把哲學、文學、美學等等問題攔在一邊。

一 「遺產」代表者之一

在三十年以前，即在一八六七年，祖國誌雜誌開始刊載斯加爾金所著的題名在偏僻地方和在首都的一些政論文章。這些文章在三年、即一八六七——一八六九年之間陸續地發表了出來。在一八七〇年，作者把這些文章收集起來，以同一的題名印出了單行本[●]。閱讀這一本現在幾乎被人忘却了的書，對於我們所研究的問題、即對於弄清楚『遺產』代表者對民粹派分子和『俄國學生們』的態度問題，是非常有教益的。該書底名稱是不確切的。作者自己也看到了這點，並在自己書底前言中解釋道：這本

● 斯加爾金，在偏僻地方和在首都，聖彼得堡，一八七〇年，第四五一頁。我們沒有可能找到這些年份的祖國誌，所以只利用了這本書。

書底主題是『首都』和『鄉村』的關係問題，即關於鄉村的政論文章；他沒有打算專門談論首都。這就是說，他也許打算過，他認為這不方便：*us de bobloquei—on d'evquei*（像我所能够的那樣去做，我不願意，像我所願意的那樣去做，我又不能夠），——斯加爾金爲了說明這個不方便處，引證了一個希臘作家底話。

我們且簡短地敘述一下斯加爾金底觀點。

我們且從農民改革這個問題開始，因爲每個願意敘述自己關於經濟和政論問題的一般觀點的人，直到現在都必然一定要從這個問題出發。在斯加爾金底書中，農民改革這個問題佔有了很大的篇幅。斯加爾金幾乎是第一個這樣的著作家，根據廣泛的事實和對整個農村生活的詳細考察來有系統地表明農民在實行改革後的窮困狀況，他們的生活惡化情形，以及他們在經濟、法律和生活方面的新的依賴形式，一句話，表明一切直到現在爲許多研究與記述所十分周密而又詳盡地指出和證明過的東西。現在這些真理並不是什麼新穎的東西了。但在當時它們不僅是新穎的，而且引起了自由派團體底猜疑，因爲自由派團體害怕：在這些對所謂『改革底缺點』的指出後面，是否隱藏着對於改革以及對於被掩蓋着的農奴制的指斥。增加對斯加爾金觀點的興味的還有

下列事實：作者是改革時期的人（也許甚至是參加改革的人。我們手邊沒有任何關於斯加爾金的歷史和著述的資料以及任何關於他的生平事業的材料）。因此，他的觀點是基於對當時的『首都』和當時的『農村』的直接的觀察，而不是基於書齋裏的對書本材料的研究。

在斯加爾金對農民改革的觀點中，首先使習慣於民粹派在這個題目上的甜蜜的空話的當代讀者特別注意的，便是作者底頭腦非常清醒。斯加爾金在觀察改革時沒有任何自欺，沒有任何理想化，他把改革看作雙方——農民和地主——之間的協定，因為農民和地主在此以前是在某種條件下共同享用土地，而現在他們分開了，同時他們一分開，雙方的法律地位也就改變了。決定分開的方法和決定每方所得的土地數量的因素，是雙方底利益。這些利益決定了雙方底企圖，而一方之有直接參加改革和實際解決改革底各種問題的可能，就中也決定了一方之佔優勢。斯加爾金對改革的了解正是如此。關於改革底主要問題，即關於份地和繳款問題，斯加爾金在自己的許多報告中屢次特別詳細地論述過（斯加爾金底書包括有十一個具有獨立內容的報告，在形式上很像農村通信。第一個報告是在一八六六年，最後一個報告是在一八六九年）。關於

所謂『少地的』農民，斯加爾金書中對於當代讀者當然沒有什麼新穎的東西，但是在六十年代末，他的證明是既新鮮又可貴的。當然，我們不去重述這些材料，我們只指出斯加爾金在說明現象方面的特點，——這個特點使他有利地區別於民粹派。斯加爾金不是說『少地』，而是說『農民割地太多』（第二一三頁、第二一四頁及其他許多頁；參看第三報告底題目），說農民改革法所規定的農民最大份地比實際的數量要少些（第二五七頁），並且舉出農民對改革底這一方面的非常特出和典型的意見。斯加爾金對這一事實的解釋和證明是非常詳細的、有力的，對於一般非常溫和、冷靜並且按其一般觀點無疑是資產階級的著作家講來甚至是很尖銳的。如果像斯加爾金這樣的著作家也這樣激烈地談論起來，可見這個現象是很觸人心目的。關於繳款太重，斯加爾金也談論得非常激烈和詳細，用許多事實來證明自己的論點。『過分的賦稅，——

●『他（着重點是作者所加的）這樣分割了我們的土地，使我們沒有這塊割地就活不下去；我們自己的土地四面八方被包圍住了，連牲口都趕不出去；現在你要爲份地特別付出東西，爲割地也要特別付出東西，並且要多少就得付出多少』。『這算是什麼生活改善！——一個以前是繳租的有經驗和識字的農夫對我說，——加在我們身上的租金和以前一樣，而土地却被割去了一些』。

我們在第三個報告（一八六七年）的副標題下面讀道，——是他們（農民）窮困底主要原因，而且斯加爾金指出賦稅高於農民種地的所得，引證『賦稅委員會報告』關於俄國賦稅在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間的分配材料，原來下層階級負擔了全部賦稅百分之七六，而上層階級則只擔負百分之十七，至於西歐賦稅分配的比例無論在什麼地方對於下層階級都更有利得無可比擬。在第七個報告（一八六八年）底副標題下我們讀道：『過重的稅款是農民貧困最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表明：生活底新條件是如何立刻要求農民出錢、出錢、又出錢，『農民改革法』是如何把廢除農奴制度需要農民補償地主這一條當作了法則（第二五二頁），租稅數目是如何『根據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長所供給的真正材料、即完全任意編造出來和一點也不可靠的材料所規定的』（第二五五頁），因此，由委員會所獲知的平均租稅，實際上比真實的平均租稅要高些。『除了租稅沉重而外，對於農民又加上了幾百年來所享用的土地之喪失』（第二五八頁）。『如果贖地底估價不是根據租稅底總和，而是根據土地在解放時代的真正價值，那末繳納贖金就會是很容易進行的事情，甚至不會需要政府來協助了，也不需要發行信貸紙票了』（第二六四頁）。『按照二月十九日改革法底意思應當減輕農民負擔並使農

民生活改善得以實現的贖金，其實往往使農民受到更大的限制』（第二六九頁）。我們作這些引證——它們本身並不有趣，而且部分地是陳舊的——是為了表明一個敵視農村公社並在許多問題上就像真正的自由貿易學派分子發表意見的著作家站在農民方面如何激烈地講話。有一點指出來是很有教益的，即民粹派底幾乎所有不反動而有益處的論點是與這位自由貿易學派分子底論點完全一致的。不用說，雖然斯加爾金抱有這種觀點，可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像民粹派分子過去和現在那樣沉醉於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說什麼改革批准了人民的生產，說它比西歐的改革要優越些，說它把俄國好像變成了 *tabula rasa* 等等。斯加爾金不僅沒有說和不能說一句這類的話，而且甚至直捷地說過：較之西歐，我們所實行的農民改革在條件上對於農民要不利些，它所帶來的好處也要少些。『我要直捷地提出問題來，——斯加爾金寫道，——我們試問一問自己：為什麼我們這裏的解放就不像本世紀最初二十五年在普魯士和撒克遜的解放那樣很快地便可看到好處，而且這個好處加速地增長着呢？』（第二二一頁）。『在

普魯士，就如在德國各處一樣，須要贖取的不是農民早已依據法律成爲其財產的份地，而是農民必須向地主作的工役』（第二七二頁）。

我們現在且從斯加爾金所評價的改革底經濟方面轉到法律方面。斯加爾金是連環保、護照制度、以及農民『村社』（和小市民社團）對其成員們的家長制權力底死敵。在第三個報告中（第一八六七頁），他激烈主張廢除連環保、人頭稅和護照制度，指出必須執行平等的按產納稅制度（？），用免費的和無限期的身份證來代替護照。『在祖國內繳納護照稅，不論在其他任何文明國家裏，都是沒有的』（第一〇九頁）。大家知道，這種稅只是在一八九七年才被廢除了。我們在第四個報告底題目下讀道：『農業村社和城市杜馬在辦理護照和徵收外出稅方面是任意橫行的』……『連環保是十足的好莊稼人爲了游民和懶漢而必須拖着的沉重羈絆』（第一二六頁）。對於當時所看到的農民分化現象，斯加爾金想以上升者和下降者底個人品質來解釋。——作者詳盡地描寫住在聖彼得堡的農民在獲取護照和延期登記方面的困難，並且駁斥一些人這樣的異議：『謝天謝地，這一整羣無地的農民沒有登記要到城市裏來，沒有增加沒有不動產的城市居民數目』（第一三〇頁）。……『野蠻的連環保』……

(第一三一頁)。……『試問：身處這種地位的人，難道可以叫作有公民自由權利的人嗎？這難道不是 *stebae adscripti*？』^① (第一三二頁)。人們把罪過歸到農民改革上去。『但是立法把農民從地主的羈絆下面解放出來了以後，就不會想出什麼來使農民擺脫村社和護照登記處的羈絆，這難道是農民改革底罪過嗎？……如果農民既不能自主地決定自己居住的地方，又不能自主地選擇自己的職業，那末公民自由底標誌何在呢？』(第一三二頁)。斯加爾金極其正確和中肯地把我們的農民稱為『有固定住所的無產者』^② (第二三一頁)。在第八個報告(一八六八年)底標題下我們讀道：『把農民固定在村社中和份地上就阻礙他們生活底改善，……阻礙外出工藝底發展』。

① — 古羅馬帝國時代的農民；他們被固定在土地上，不管這些土地對他們如何不利，也不能離開它們。——編輯部

② 斯加爾金很詳細地表明了不僅這個定義(無產者)底第一部分是正確的，而且第二部分也是正確的。他在自己的報告中用許多篇幅來描寫了農民底附屬地位及其窮困，描寫了雇農底艱苦狀況，做了『一八六八年飢荒的描寫』(第五個報告底標題)，以及描寫了奴役農民和侮辱農民的各種形式。就像在九十年代一樣，在六十年代也還有閉口不談和否認飢荒的人。斯加爾金激烈地反對他們。自然，關於這個問題作詳細的引證是多餘的。

『除了農民的無知和不斷增加的賦稅壓榨着他們以外，阻礙農民生產發展，因而阻礙農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農民之被固定在村社中和份地上。把勞動的手束縛在一個地方並用堅固的紐帶把農業公社網綁起來，這是一個本來對勞動發展、個人企業和小土地私有都是極端不利的條件』（第二八四頁）。『固定於自己的份地和村社、沒有可能把自己的勞動應用到生產率較高和對自己較有利的地方的農民們，好像已經停留在剛從農奴制度一出來就走了進去的擁擠雜沓的、像牲畜一樣混成一團的、不生產什麼東西的生活方式中』（第二八五頁）。由此可見，作者完全是從純粹資產階級的觀點來考察關於農民生活的這些問題，但是雖然如此（更確切些說，正因為這樣），他非常正確地估計了把農民固定起來對於整個社會發展和農民本身的害處。這個害處（我們且添加一句）對於最下層的農民集團、對於農村無產階級，是特別厲害的。斯加爾金很中肯地說道：『法律之關心不使農民始終沒有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記：農民自身對於這個問題的關心，比任何立法者都更強烈得不可比擬』（第二八六頁）。『除了被束縛於自己的份地和村社而外，農民即使暫時外出做些零工以餬口，但由於連環保和護照制度，必須遭受許多限制和耗費』（第二九八頁）。『據我看來，

對於現在處在困難中的許多農民，出路是會有的，如果採取……使農民易於離開土地的措施」（第二九四頁）。在這裏斯加爾金表示了與民粹派的各種方案極相矛盾的願望，而民粹派底這些方案歸結起來恰好相反：把公社固定下來，份地不能出賣等等。直到今天許多事實完全證明了斯加爾金是完全正確的：保持農民之束縛在土地上和農民公社底等級的閉關自守，只能使農村無產階級底狀況惡化起來，並阻礙全國經濟發展，絲毫也不能使『有固定住所的無產者』不致陷入最壞的奴役和依賴地位，使工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落到最低的地步。

從上面的引證中讀者已經能看出：斯加爾金是公社底敵人。他是從私有財產、個人企業等底觀點反對公社與平均的（第一四二頁及以下各頁）。對於擁護公社的人，斯加爾金反駁道：『永恆的習慣法』，其時代已經過去了：『在一切國家裏，隨着農村居民之接近文明環境，習慣法便會喪失其原始的純潔性，遭受毀損和歪曲。我們這裏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村社底權力漸漸地變成豪紳和鄉村文書底權力，結果這個權力並不是保護農民底人格，反而成了他們的沉重的羈絆』（第一四三頁），——這個意見是非常正確的，它三十年來已經被不可勝數的事實所證明了。據斯加爾